

●柯平 赵益民 高爽

改革开放 30 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研究回顾与思考

摘 要 近三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一次对经验描述的历史传承和两次关于研究范式及研究重心的重大转折。图书馆学理论创新集中体现在关于研究客体的认识和图书馆活动主体的自省两大方面。但是与此同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还存在理论脱离实际、实证研究方法不足和缺乏学派研究模式等缺陷,未来还需要继续鼓励学科争鸣、拓展国际化研究视野、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保障人文与科学并重。表 1。图 1。参考文献 27。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 学科发展 综述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es in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can be summarized as one time of historical inheritance of experimental descriptions and two times of significant shift of research paradigms and research focuses.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of library science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recognition of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reflection of library activity subjec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of the separation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s, the lack of practical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lack of scholastic research pattern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authors propose some recommendations. 1 tab. 1 fig. 27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Basic theory.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Summary.

CLASS NUMBER G250

1 文献综述

我国图书馆学自 20 世纪初诞生以来,一直重视基础理论研究。除了专业教学和相关学术交流活动,大量的研究成果也在各级各类出版物,特别是学术期刊上发表出来,最新的学术思想得以公开交流,既往的理论成果得以归纳提炼,国外的优秀学说得以引介推广,来自实践的反馈也得以充分体现。

我国图书馆学界历来重视对研究历程的回顾和思考,综述总结性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基础理论与整个学科一起经历了曲折

而又令人瞩目的发展进程。要准确把握其中的内在规律,清楚认识理论的沿革,就有必要进行一次阶段性的全面梳理。“文化大革命”对包括理论研究在内的各项图书馆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 1978 年以后的社会变革则为基础理论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是跨越了时代断层的飞跃,整个学界焕发的活力催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根据对 CNKI 和全国报刊索引的检索,三十年来关于基础理论的论文有近 5000 篇之多,涉及到研究对象、内容、学科体系、原理、性质等主要类别,按年代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成果统计表(单位:篇)

年代	对象 内容	学科 体系	研究 方法	理论 基础	原理	性质	理论 教育	图书馆 哲学	图书馆 权利	图书馆 精神	发展 战略	回顾 综述	总计
1978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979	3	3	2	0	0	0	0	0	0	0	0	2	10
1980	9	9	3	0	0	3	0	0	0	0	0	3	27
1981	17	14	7	1	1	3	1	0	0	0	0	4	48
1982	38	28	10	1	3	11	3	0	0	0	0	2	96

续表

年代	对象 内容	学科 体系	研究 方法	理论 基础	原理	性质	理论 教育	图书馆 哲学	图书馆 权利	图书馆 精神	发展 战略	回顾 综述	总计
1983	40	29	13	2	6	6	2	0	1	0	0	4	103
1984	31	22	11	10	8	4	5	2	0	0	0	5	98
1985	49	37	14	6	7	15	5	2	1	0	4	10	150
1986	49	48	25	6	5	8	4	2	1	1	5	7	161
1987	60	48	30	5	6	14	5	2	0	0	32	14	216
1988	55	63	25	6	6	14	6	4	3	1	11	11	205
1989	50	51	26	5	9	13	12	2	0	2	8	20	198
1990	43	53	21	5	6	6	12	3	1	3	8	18	179
1991	42	40	20	5	9	4	5	2	0	2	5	14	148
1992	52	41	16	7	9	9	8	2	0	4	4	16	168
1993	35	47	18	6	1	7	4	3	1	2	4	11	139
1994	23	30	13	2	4	5	4	2	1	5	3	13	105
1995	22	44	25	3	4	7	0	1	1	1	13	11	132
1996	27	33	12	4	3	5	5	3	6	6	19	21	144
1997	17	27	10	2	3	1	2	5	2	8	7	13	97
1998	29	40	12	3	6	3	7	5	2	9	10	15	141
1999	32	35	14	4	9	4	3	7	2	6	11	17	144
2000	28	36	17	5	7	3	2	6	8	8	11	11	142
2001	24	45	14	4	4	4	6	16	2	21	18	14	172
2002	48	44	16	3	6	2	2	6	11	18	17	16	189
2003	48	37	16	6	12	5	4	9	16	36	16	24	229
2004	49	49	23	9	11	4	9	14	24	69	11	31	303
2005	47	57	23	4	16	3	3	13	24	119	15	19	343
2006	54	57	25	7	26	5	6	14	32	129	14	25	394
2007	68	61	27	9	32	3	9	19	47	106	11	15	407
总 计	1090	1128	488	130	219	171	134	144	186	556	257	386	4889

注:本表数据统计截止日期为 2008 年 1 月 12 日。

以往的综述性研究成果或者针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某个局部,如研究方法^[1],或者截取一定的时间段做分类概述,如建国后的五十年的整体回顾^[2]。这些惯用的研究方法难免造成对理论发展延续性的人为割裂,难以从横向和纵向的多维视角深入探究学科进程的本质规律。本文力图在充分的文献调研的基础上观察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特点,结合国内外的社会背景,探寻理论研究发展的影响因素,总结学科演进的内在规律,打破简单分类的框架,深入分析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主体沿革和创新所在,进而结合对以往研究局限性的剖析,预测变革趋势,展望未来发展。

2 学科发展轨迹

近三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走过了一段不平坦的道路。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致使发展的进程转折起伏,跌宕起伏。从学术成果的统计数据来看,学界对基础理论的研究既不是持续地高度关注,也并非均衡地面面俱到,逐年的走势如图 1 所示。结合对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将三十年来的发展主要归纳为一次对经验描述的历史传承和两次关于研究范式及研究重心的重大转折,这是一条贯穿和统领迄今为止研究进程的主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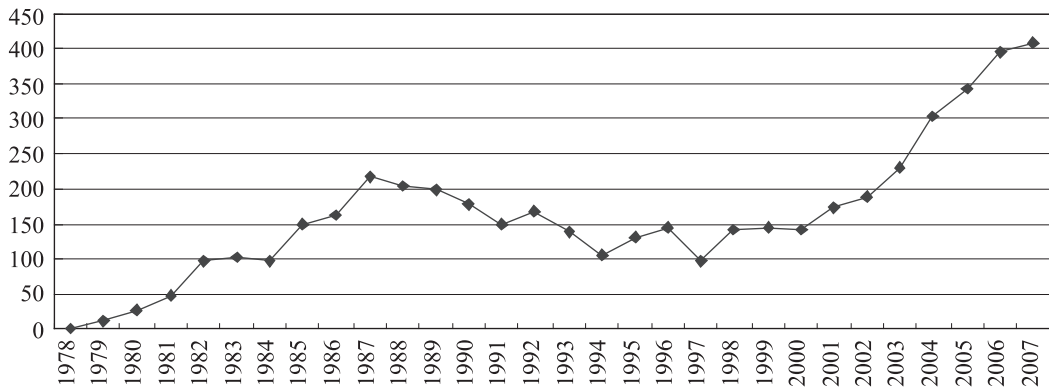


图1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成果统计走势图(单位:篇)

2.1 建立在时代断层上的经验主义传承

十年的“文革”几乎给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带来了一片空白,专业杂志普遍停刊,学科教育长期中断,许多图书馆都被迫关闭,值得一提的研究成果仅有1974年的《汉语主题词表》启动编制和1976年刘国钧对美国MARC著录的研究^[3]。这样衰败薄弱的理论研究和事业发展局面使得改革开放之初的图书馆学肩负着艰巨的跨越时代断层的历史传承任务。

在百废待举的理论界,以刘国钧和周文骏为代表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图书馆学家开始了广泛的研究,成果累出。前者专注于计算机编目^[4]和西方的图书分类法^[5],后者则提出了“文献交流论”的最初思想^[6]。随着1977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正式恢复招生,教育发展对理论界提出了编订教材的迫切需求,经过两校多名专家的协作努力,作为一本统编教材的《图书馆学基础》于1981年出版。它一方面革命性地抛弃了此前同类教材所富含的政治批判色彩,另一方面也保留了“文革”前我国学界长期秉承的经验描述传统。这时的图书馆学家们尚未接受解放前就被徐家麟引介进来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巴特勒的新图书馆学思想^[7],理论构架还停滞在杜威图书馆学的水平,因此很快就招致多方质疑,以研究对象为主的大讨论迅速扩展到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等领域。彭修义倡导对“知识学”的研究^[8],刘迅引入“世界3”理论^[9],宓浩提出“知识交流”的观点^[10]。一次次对“实用派”经验图书馆学的冲击导致了传统理论研究范式的危机升级,整体变革势在必行。

2.2 从机构化经验描述到社会化功能发挥的研究范式变革

“范式理论”的创始人托马斯·库恩认为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是“按一定规律和周期出现的结构”,科

学发展的路线是一条并非渐进性的路线。“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11]。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对我国的长期影响使得改革开放初期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仍呈经验描述的研究范式,理论视野局限在图书馆机构内部,以工作流程的分析总结和事业发展的组织规划为主要研究内容,在社会转型的背景和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其内在的理论缺陷日益凸现。

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表明了国家对图书馆事业前所未有的重视,极大地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以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为契机,全国图书馆工作广泛开展,加深了理论家们对图书馆在社会系统中作用和影响的认识。

1981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恢复了在IFLA中的国家协会会员的合法席位,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学术交流得以开展。刘迅对芝加哥学派的评介和推崇^[12]强化了国内学界对作为“社会装置”的图书馆的重新认识,推动了对经验图书馆学的批判性反思,加上对谢拉的社会认识论的理解和认同,在社会的知识活动中研究图书馆问题的基本理念逐渐普及。

正如库恩借用“格式塔”(Gestalt)来描述范式的转变,这时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眼中的图书馆已从一个充满诸多要素并独自运行的机构渐变为社会大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与别的一部分一样承担着自己的职责,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各种关于“交流”的思想在这个时期纷纷涌现,并以1984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在杭州召开的基础理论研讨会为契机,一举登上学术舞台。会议中提出的“知识交流”、“文献信息”^[13]等重要概念以及随后出版、发表的“情报交

流”^[14]、“文献交流”^[15]、“文献信息交流”^[16]等学术论著彻底地将传统的经验描述范式转变为基于系统分析的“社会功能”范式,杭州会议也因此成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杭州会议在学术史上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促成了研究范式的变革,其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在众多辩论与争鸣中,学者们没有禁锢于编制“统编教材”之类的行为,而是认识到“最好的检验学派学说优劣的方式是让它们在宽松的理论环境中各自进行理论建设,并由它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理论内在逻辑以及理论的被认同程度来检验它们的真理性”^[17]。这也就是在研究范式转变之初,即“前范式时期”通常会出现的对合理的方法、问题和标准答案的争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确定学派而不是为了达成一致^[18]。

2.3 源自技术进步的研究重心转移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范式的变革,呈现出一片众说争鸣、交相辉映的繁荣景象。诸多理论既来自于学者的思辨,更来自于社会的实践。无论任何学说的兴衰发展都要经历实践的检验,经受社会大环境的直接影响,基础理论研究在此后的进程中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改革开放促使经济飞速增长,而公共图书馆的经费却在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不断提升的书刊定价出现了首次下滑。事业的萎缩冲击着图书馆人的职业信念,更广泛的信息产业化、商品化则导致了传统理念的蜕变:有偿服务被倡导,优秀人才在流失,连理论研究者的工作也被批评为严重脱离实践的“学院式思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除了少量的图书馆发展战略研究,几乎没有亮点。伴随着事业的衰落,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萎缩、质量下降,整体步入低谷,期待着新的发展契机出现。这次契机不再是由观念引发的变革,而是由技术带来的震撼,更准确地说,是信息技术应用于图书馆而产生的一系列深刻的转变。

图书馆历来不乏对新技术的引进运用,但没有任何一次能与信息技术相比,其作用的彻底和影响的深远足以辐射从服务体系到理论研究的各个层面。发端于1991年的Mercury计划,体现了当时局域网的最高技术水平,此后的“美国记忆”项目(American Memory)和数字图书馆先导计划(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 DLI)促使图书馆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结合中科院图书馆从1976年就开始的现代化研究,我国图书馆界迅速被信息技术的魅力所吸引,“数字图书馆”这一崭新的概念成了实践界和理论界

共同关注的对象,基础理论的研究重心从概念探讨逐渐转为面向应用。

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IFLA大会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出现回升发展的转折点,与此同时兴起的“关于图书馆未来的对话”的大讨论则引发了学界对新形式图书馆及其新体系理论的严肃思考。作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数字图书馆不仅牵动着传统事业的兴衰发展,而且通过研究重心的转变,促使学者以新的面向应用、联系实践的眼光来审视和推动基础理论的研究,随之出现的关于电子图书馆^[19]和信息资源共享^[20]的研究均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中国图书馆学会基础理论分会2000年召开的常州会议进一步将网络确定为新的理论生长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高速发展时期。

3 理论创新概要

任何学科理论的发展,除了受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研究范式变革的策动之外,最根本的内驱力来自于自身的创新,整个学术发展史就是由无数的创新进化构成的。回顾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从理念到方法,从教育到应用,创新之处比比皆是,综合起来,可以从图书馆学研究的客体 and 图书馆活动的主体两个方面进行概要性的分析。

3.1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客体的审视

文献调研结果表明,在各类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论文占了极大比重,体现了学术界对其历来不减的关注程度,说明我国图书馆学界始终强调对研究客体的认识和论证。

沿着时间的纵线探寻,不难看出图书馆学研究客体一条明显的发展脉络:图书馆工作→信息活动→知识资源,表现出从机构要素到运行规律,再到学科本质的演进创新过程。关于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改革开放初期的认识仅局限在以“要素说”为基础的经验描述上,以杭州会议为标志的范式变革催生了探寻活动规律和本质的创新。20世纪90年代后期,受国外有关知识研究的影响,图书馆学研究在“知识”领域广泛展开,从本质的溯源上升到学科层面,力图回答关于图书馆学任务、宗旨和存在意义的终极问题。以“知识资源论”^[21]为代表的观点更是通过资源利用的理念,将研究视野开创性地拓展到诸多交叉领域,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开辟了多维研发的空间。

从21世纪的研究态势来看,各种创新学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可通约性。这种现象说明没有任何理论能够解答在一定时期内面临的所有难题,也由

此告诫学界:这种不完备、不完美的性质是创新型思想所特有的,不能因此随意抛弃或忽视任何形式的创新,只有兼容并包、和而不同,才能通过实践的检验探求学科的本质,推动理论研究的进步。

3.2 关于图书馆活动主体的自省

除了客体对象,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还非常关注对包括用户、馆员及相关学者、老师和学生等能动群体在内的图书馆活动主体的研究。与研究客体不同,对图书馆活动主体的认识因其主观世界的多样而更趋复杂,也因其复杂多变而极具探究价值,成果丰硕,创新迭出。

对图书馆活动主体的自省认识同样可以理出一条主要的发展脉络:精神——权利——核心价值,其中包含从馆员自身信仰的追求到职业存在依据的确证,再到所有主体的最高责任与使命的概括,体现了对主体社会价值认识的创新和发展。

现代图书馆事业诞生之初便伴随着图书馆精神的思考和讨论,长期的积累形成了丰厚的关于职业认识的“精神积淀”。新世纪提出的图书馆权利则将关注的视线从馆员转向用户,力求通过探究用户基本权利的保障机制来明确图书馆的社会存在依据,随之产生的“制度图书馆学”^[22]便是学科建设方面的创新之举,由此将芝加哥学派眼中的“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装置”发展成为维护公民权利的“制度保证”。

以研究图书馆未来发展著称的戈曼(Michael Gorman)近年来大力倡导图书馆核心价值,并将其总结为八个方面:管理、服务、思想自由、取用平等、隐私、素养与学习、理性主义、民主^[23]。这个在国外广受关注的概念很快引起了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界的重视,并在最近的学术研讨会上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对象。作为一个组织最重要和最永恒的信条,核心价值无疑能起到凝聚馆员队伍、塑造职业形象、推广机构文化等多重作用,能够将组织内部利益与更高的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寻求稳固的行业灵魂,使馆员的精神诉求与用户的合法权益相融合,使图书馆事业的能动因素在共同拥有的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下做出社会所需的最大贡献,并感受由此产生的崇高荣耀。

4 局限性分析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30年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历程,研究范式的转变给理论发展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基础理论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不足,阻碍着学科的发展。这些不利因素涉及到研究宗旨、方法和学术规范等诸多方面,极大地影响着学科建设的进程。

4.1 缺少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

与应用理论相比,基础理论尽管与实践活动的关

系更为间接,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理论研究过程与实际的联系不应有任何的疏忽,然而现状却并不令人满意。实践工作者抱怨理论界的成果缺乏足够的指导性作用,抱怨理论脱离实践,偏离了图书馆学的本源;相关学者则将大部分目光驻留在纯理论的课题研究上,缺乏来自实践活动的基础与检验。不仅文献调研的结果表明了这一现状,许多专家在研究中也不断地强调这一不足。2007年11月29日在重庆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图书馆学会基础理论研讨会中,王宗义再次强调了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吴慰慈更是将理论联系实践视为“永恒的话题”^[24]。

4.2 缺少实证性的科学方法

根据本文的统计,30年间涉及“研究方法”这一主题的论文有488篇,仅占基础理论论文总数的9.98%,其中“实证方法”的研究成果更是不足。尽管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科学方法的合理运用,但仍存在着思辨性成果过多的现象。改革开放初期,研究者开始批判“经验式图书馆学”,从而转向抽象性的探究思考,虽然少了一些主观色彩,但理论研究一直没有摆脱旧思维的困扰。国外相关成果中,除了一些综述类研究论文,大部分论著都会有一节专门介绍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让读者明了开展研究的科学基础,体现推理和论证的严谨性与可信度,其中蕴含的实证精神也正是我国以往那些重感悟、纯思辨的研究所缺乏的。

4.3 缺少模式化的学派式研究

目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一个特点是分散式研究较多,集团式研究或学派式研究较少,如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就有五十余种^[25],到90年代末则有五六十种之多^[26]。许多“学说”提出后,也缺乏研究者本人的深入后续研究或他人的系统全面跟进,如“规律说”、“知识交流论”、“可获得性论”等。在这方面,我们应借鉴芝加哥学派的经验,它不仅为美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带来一个崭新的科学、实证主义阶段,学派的理念与精神的传承还极大地延续了理论生命力,扩大了学术影响力。这种具有重要作用的“学派效应”能有效地避免研究分散的弊端,值得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吸收借鉴。

5 未来发展展望

5.1 学术规范:争鸣科学化

学术争论是各执己见、互相促进提高的有益活动。在整体研究格局中鼓励多元、多视角的同时,也要改变目前学说林立、“不破不立”的状态。如果不同的学术观点没有在争鸣辩论中达到理论的升华与促进,那么问题将依然存在,读者或许反而“一头雾

水”。理论研究中应该鼓励更多的争鸣,但不应该是缺乏论证的或限于表层的简单驳斥,要围绕共同感兴趣的有价值的问题开展不同思想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无论是针对焦点的探讨还是在“求异”的过程中另成一派,必须坚持“创新”这一争鸣的灵魂和目标。技术层面的“如何商榷”、“怎样回应”等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内容分析等相关方法将得到更深入的运用,关于争鸣现象自身的研究也能促进理论的成熟与完善。

5.2 研究模式:视野国际化

理论研究一方面要有国际视野,发展国际图书馆学研究^[24],另一方面也不能放弃各国的自身特色,应该在保留本土化特色的同时协调发展。伴随着信息时代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等飞速发展,社会各个层面的全球化态势日益凸显,国际化的发展也将是图书馆事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为适应外部环境的转换,需要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有针对性地作出反应,突破传统和地域的局限开展更广泛而系统的研究。我国学者不仅需要研究各国图书馆学的共性问题,还应在充分了解国情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特色,参与国际交流,争取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应有的话语权,以此推动国内外图书馆事业的进步。除了积极汲取国际新思想,新方法,还要努力将我国的优秀成果在全球学界进行展现,促进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国际化发展。

5.3 指导思想:理论与实践结合

就理论工作者自身而言,避免与实践活动疏离脱节将成为研究发展的必要前提。指导实践始终都是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得到实践的检验也必然是理论进步的根本保障。与此同时,实践工作者对基础理论的吸收、探讨、利用和拓展也将成为其业务质量提升的有效手段和途径。从社会体制到学界自身都要给理论与实践营造融洽的交流氛围,提供相互促进的沟通机制。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认识水平和技术环境等影响因素的发展离不开实践活动的推动,任何具体服务的开展也都难以做到尽善尽美,图书馆事业的全面进步同样离不开基础理论的运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将作为一条基本的原理,贯穿在未来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

5.4 基本精神:人文与科学并重

从以往的成果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较多地带有经验的特征,90年代则开始偏重技术的应用。近十年来又显现出人文研究的趋向。吴晞先生认为“人文关怀精神并非图书馆一个学科所独有,但图书馆无疑是最应高举人的旗帜,突出人的精神的行业之一,因为它面对的是人,直接为人服务,人是其出发点,又是其根本目的,人的因素

第一,公众精神至上,永远是图书馆的根本准则”。“只有人文关怀,才是图书馆之所以成为图书馆,图书馆之所以在社会上存在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理由。”^[27]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学术年会从2002年的“图书馆服务模式与用户需求”到2005年“以人为本,服务创新”,再到2006年“面向大众的人文关怀”也明显地反映了这一趋势。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未来图书馆学研究不应有所偏废,精神与技术应统筹兼顾,科学与人文应协调发展。既要弘扬科学精神又要避免造成人文关怀的缺失,要正确理解二者之间相互制约、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

参考文献:

- [1] 马艳霞. 我国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的回顾与思考[J]. 图书馆建设, 2004(2): 9-12.
- [2] 马恒通. 新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50年(1949-1999)[J]. 大学图书馆学报, 1999(6): 29-32.
- [3] 刘国钧. 马尔克计划简介——兼论图书馆引进电子计算机问题[J]. 图书馆工作, 1975(试刊号): 37-43.
- [4] 刘国钧. 用电子计算机编制图书目录的几个问题[G]//刘国钧. 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集.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330-340.
- [5] 刘国钧. 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J]. 社会科学战线, 1978(1~2): 341-346, 324-339.
- [6] 周文骏. 图书馆工作的传递作用、体系和发展[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1979(1): 6-11.
- [7] 徐家麟. 关于图书馆学的认识几点观察[G]//中国图书馆学会. 百年文萃: 空谷余音.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5: 89-94.
- [8] 彭修义. 关于开展“知识学”的研究的建议[J]. 图书馆学通讯, 1981(3): 85-88.
- [9] 刘迅. 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J]. 情报科学, 1982(1): 13-20.
- [10] 宓浩. 知识、知识材料和知识交流——图书馆情报学引论之一[J]. 图书馆学研究, 1983(6): 28-35.
- [11] Kuhn, Thomas,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 Second Edition, Enlarg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70(1962).
- [12] 刘迅. 西方图书馆学流派及其影响[J]. 图书馆学刊, 1983(4): 1-12.
- [13] 况能富. 应当探索文献信息理论:《文献信息论导言》[J]. 图书馆工作, 1984(4): 41-44.
- [14] 张晓林. 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J]. 图书馆学通讯, 1985(3): 57-64.
- [15] 周文骏. 文献交流引论[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24.
- [16] 倪波, 荀昌荣. 理论图书馆教程[M]. 天津: 南开大学

读者来信

刘家真教授:您好!

我是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邱晓刚,从事古籍修复与保护工作三十年了,今天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上看到您的“中国古籍保护的问题分析与战略研究”一文,让我从心里叫好。这里也想将个人在古籍修复保护工作一线中,所见所闻和想法,向您反映,也希望能引起您的重视,并通过您的中国图书馆学会文献修复与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教授专家的身份,来关注这些问题。

我想说的还是古籍修复的人员和队伍建设的问题;近来各方面报导都谈到古籍修复专门人才匮乏的问题。古籍修复行业真的如此缺人吗?我说应该是改行的超过了从事的。古籍修复行业,是一个特殊性行业,它的特殊在于它是一个完完全全纯手工的工作,并要求从业人员“既要能守得住清贫,又要能耐得住寂寞;既要工作细致耐心,还要认真负责,不厌其烦。”所以如果对这样的特殊性行业,没有特殊性的政策规定和标准来支持,能有多少人愿意几十年如一日地干这项工作?又怎么会有更多的人去改行!!这里想说一个现实情况:目前国内古籍修复专业还没有本科毕业生,二年以后才有,有的也是您所说的升本的;而职业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和专科生,目前毕业的就有150人之多,在校学习的还有一百多人。而真正毕业后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不到十人,原因是全国各类图书馆非本科生不用,这难道不是一种

浪费吗?!就这十五个从事古籍修复的幸运儿中,他(她)们的收入情况又如何?广东地区在1000至2000元左右;而北京地区800至1200左右;南京地区最少的在600元左右。这样的收入情况让这些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年青人怎么能不改行,如此这般不要说过去改行的大有人在,将来改行的人也不会少呀!!!目前,古籍修复与保护工作得到中央重视,文化部重视,但是关键还要各基层单位的领导重视才是真的。我认为目前古籍修复行业不是缺人,缺的是机制、体制!!!古籍修复行业应该实事求是,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过去几十年古籍修复工作不被重视时,对学历没有要求,什么样的人都能去搞古籍修复,而今非本科生不用,研究生、博士生最好。我一直认为这是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古籍修复这支队伍的建设和其它行业一样,也应该是金字塔式的,没有一个庞大的基础,金字塔是无法建成的。就目前古籍修复工作的现状来看,缺的是大量从事基础修复工作的人员!啰嗦嗦说了这么多,希望能引起专家们的重视!

此致

敬礼

南京大学图书馆

邱晓刚敬上

2008年8月25日

编后:编发的稿件能得到读者的回应、能引发读者的思考和讨论,这是学术刊物应有的功能,也是对编辑最好的回报!收到转发过来的邱晓刚先生的来信,其字里行间对振兴古籍修复事业的真切关注,令人感动!感谢刘家真教授和邱晓刚先生!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在阅读本刊的同时,积极发表评论、开展学术讨论。

- 出版社,1986:31.
- [17] 范并思等. 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278.
- [18] 刘钢.《科学革命的结构》导读[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44.
- [19] 汪冰. 电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8-19.
- [20] 范并思. 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理论的新视野——兼评《上海地区文献信息资源共享问题研究》[J]. 情报资料工作,1999(4):1-3.
- [21] 柯平. 知识资源论——关于知识资源管理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J]. 图书馆论坛,2004(6):58-63,113.
- [22] 蒋永福. 知识权利与图书馆制度——制度图书馆学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5(1):10-14.
- [23] 戈曼撰;林珊如译. 数字时代的图书馆价值[OL]. [2008-01-21]. <http://www.lac.org.tw/epaper/200604/library-value.pdf>.

- [24] 吴慰慈,许桂菊.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成果及展望[J]. 图书馆,1998(5):1-4.
- [25] 刘烈. 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上)[J].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5(1):8-13.
- [26] 马恒通. 新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争鸣50年(1949—1999)[J]. 图书馆,2000(1):18-23,33.
- [27] 陈亚召. 2000年以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若干研究热点问题述评[J].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7(13):159-160.

柯平 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通讯地址:天津市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邮编300071。

赵益民 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博士研究生,副研究馆员。通讯地址同上。

高爽 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硕士研究生。通讯地址同上。

(收稿日期:2008-01-22)